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外科学家发明家丛书

亚里士多德



一、生平简介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古希腊，他的形而上学使他荣膺“哲学家之王”的称号。

公元前 384 年——前 322 年，亚里士多德诞生于爱琴海北岸的卡基狄克半岛上的斯塔吉罗斯。他的父亲，尼各马可是马其顿王阿明塔的御医。依照埃斯克勒庇俄斯医神的惯例，这个孩子从小就跟父亲学习医道，因此从小他的心灵就倾向于经验研究。他从一开始就准备着做科学之始祖的。

亚里士多德幼年时父母双亡，由监护人普罗克塞诺斯抚养。少年时代的亚里士多德由于无人管教，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他整日酗酒作乐，以致家产让他挥霍殆尽。普罗克塞诺斯拿他没有办法，就把他送进了柏拉图开设的阿卡达米亚学园。那一年是公元前 367 年，亚里士多德 18 岁。

在学园幽静的树林中，年轻的亚里士多德的放纵的性格得到了收敛。当这颗浮躁不安的心灵平静下来，就立即被知识所吸引。于是，全部的热情又被他倾注到求知上，他不惜花重金购买书籍，研读、探究。柏拉图来到他的房间，看到架子上，桌子上，床上都摆满了书，不禁感叹：“真是读书人的房间”。亚里士多德在学园里一学就是 20 年。他一边学习一边研究问题。他在许多领域都显示了自己出色的才华，柏拉图称他为“学园的精英”。

公元前 347 年，柏拉图去逝，亚里士多德离开了阿卡达米亚学园前往阿塔内斯赫尔米阿斯的宫廷。赫尔米阿斯十分赏识亚里士多德的才华，非常希望把他留在当地，帮助自己治理城邦，就把侄女皮提阿斯嫁给了他。亚里士多德在阿塔内斯住了下来。此后第三个年头，赫尔米阿斯得罪了波斯国王，被波斯国王杀死，亚里士多德也受到了牵连，留在城邦里很危险。不久，他就带着妻子移居到列斯波斯岛的米提列涅城。皮提阿斯生了一个女儿，取了母亲的名字。皮提阿斯生下女儿一年后就死了，亚里士多德带着女儿和皮提阿斯的侍女返回了故乡。

公元前 343 年，亚里士多德应马其顿腓力浦王之邀请，担任了 13 岁的王子亚历山大的教师。这位年仅 13 岁的王子，性格热情奔放，以驯服烈马作日常的娱乐。亚里士多德的学问像清泉一样甘美，却不能熄灭亚历山大身上蕴藏着的火山一样的热情。不过当亚历山大谈及自己的恩师时，也不无感慨地说：“父亲给予我生命，但教诲我如何生活的却是亚里士多德。”他在给亚里士多德的一封信中，说：“讲到我，我想与其求胜于权力和版图的扩张，毋宁求胜于什么是善。”然而，这也许不过是一种少年人堂皇的赞誉，这个蛮族后王所生的儿子，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热心于哲学，他性如烈火，理性的羁绊对于他太脆弱了，勒不住遗传的热情。两年之后，亚历山大便抛弃哲学，登程而鞭策世界去了。

公元前 335 年，亚里士多德回到雅典。在雅典东郊的一所名叫吕凯昂的体育场自己开办了吕凯昂学园。亚里士多德主持该学园 13 个年头，一边教学，一边写作。这是他最为成熟也最有成就的时期，他传世的大部分作品完成于此时。他把弟子分成高级、普通两个班。他每天上午教高级班，课程包括哲学、物理学、辩证术等；下午教普通班，讲授修辞学、政治学等课程。因他经常率领一群弟子在校园的林荫道上踱着方步授课，所以他的学派得名“逍遥学派”。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工作得到了亚历山大的赞助。据说这位跃马东方的君主派了成千的人员供他支配，有打猎的、捕鱼的、养蜂的、喂鸟

的，等等，分布在希腊和亚洲的各个地区。这样便帮助他建成了一座规模可观的生物实验室。亚历山大还下令为亚里士多德搜集各邦各城的法律政治资料，为他提供 800 塔兰特的巨款作研究费用。

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死亡的噩耗从巴比伦传来，雅典人一时间将自己对马其顿人的怒气发泄到亚里士多德的头上；他被控犯了“渎神罪”。亚里士多德眼见大祸临头，匆匆避居于欧比亚的卡尔基斯。次年逝世，享年 63 岁。

12 个月之间，希腊丧失了她的最大的统治者和最大的哲学家。希腊的光荣在罗马的朝曦中黯淡下去，而罗马的威风并不是建立在灿烂思想之上的，只不过是权力之炫耀而已。到后来那威风也衰竭了，微光几乎要熄灭了。黑暗覆盖欧洲大陆有 1000 年之久。全世界在黑暗中等待哲学的复活。

二、弟子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就是后来建立起地跨欧、亚、非的马其顿帝国的君主。亚历山大 13 岁时，受教于亚里士多德。然而对权力和土地的渴望胜过了对知识的渴望，亚历山大并没有成为柏拉图理想国中哲学王式的君主。相反，他顺应了历史大潮的方向，成为一代天才的大帝。亚里士多德统一了希腊的哲学，他的弟子却统一了大希腊、波斯的城市，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希腊的生活方式。

亚历山大是马其顿国王腓力浦二世的儿子。在亚里士多德的教化之下，他受到了良好的希腊文化教育。他非常喜爱《荷马史诗》，崇拜诗中的英雄阿溪里，并在自己的事业中努力模仿他。

从 16 岁起，亚历山大就随父征战。在著名的喀罗尼亚战役中，他指挥马其顿军左翼，取得辉煌战果。他经常参与政务，习染统治阶级的各种思想观点和道德习惯。从儿童时代起，他就养成了好大喜功，专横霸道，妄图统治世界的性格和志向。据说，每当他得悉父亲胜利的消息时就发愁，唯恐自己会因而不能享到征服世界的光荣。他具有狂暴的热情，坚强的意志和出众的智力，有敏锐的判断和应变的才能。

公元前 336 年，腓力浦二世遇刺，亚历山大继位。公元前 334 年，亚历山大告别欧洲，7 年后抵达印度。在此期间，他歼灭了希腊商人的老对手腓尼基人；他征服了埃及，被尼罗河谷的人民推崇为法老之子，合法的继承人。据说，太阳神阿蒙曾谕示他将战胜一切敌人，成为全世界的统治者。在与波斯人的战争中，大流士曾请求媾和，并表示愿意割让幼发拉底河以西的领土，赔款 10000 塔兰特，并将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给大流士写了一封傲慢的回信，宣称，当他有可能取得波斯帝国的全部领土时，他不希望只得到它的一部分。并且他自称为“全亚洲的统治者”。推翻了波斯帝国，他下令重建巴比伦。之后，他带领军队深入喜马拉雅山腹地，将整个世界变成了马其顿的行省和属地。随后，他暂停征伐，宣布了一项更宏伟的计划。

新建立的帝国必须就范于希腊精神的影响下；人民必须学习希腊语言，必须居住在仿效希腊模式建设的城市之中。亚历山大的士兵此时成了中小学教师。昔日的军营成为新输入的希腊文化的和平中心。正当希腊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像洪水一般越涨越高之际，亚历山大突然患了热病，于公元前 323 年在巴比伦汉穆拉比王的旧王宫中逝世。

亚历山大在位期间给了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以极大的支持。如果没有亚历山大的鼎力支持，亚里士多德不可能写出关于数个学科的著作。

三、亚里士多德之事业

亚里士多德 50 岁的时候回到雅典，创设了一个吕凯昂学院。雅典人虽然仇视马其顿人，却争着送自己的子弟去求学于帝师。当时从师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如此之多，以致为维持秩序起见，不得不订立复杂的章程。规则是学生自己定的，每十日由他们中间举出一个人来管理校务。但是吕凯昂并不是一个纪律森严的学园，学生们经常和老师一起吃饭、散步，可以随时随地向老师请教问题。

这个新的学园并不是照抄柏拉图的学园，他的学园所专攻的特点是数学、玄想哲学、政治哲学，而吕凯昂学园的主要贡献则在于生物学与史学。亚历山大曾令猎人、牧人、园丁、渔夫将动物学上、植物学上的资料，凡是亚里士多德或许要用的，统统提供给他。有一次，亚历山大派他手下的 1000 人去希腊、亚洲，为亚里士多德收集动植物的标本。研究资料和经费如此之多，以至他能够建立一个空前的大动物园。

虽然有亚历山大大帝的鼎力支持，但由于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他遭到了设备和工具上的限制。规定的时刻却没有钟表；比较热度，却没有寒暑表；观察天文，却没有望远镜；测量气候，却没有风雨表。他只有一条尺、一个指南针，再加上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器具。化学的分析法，正确的度量衡，数学在物理上精深的应用，那时还不曾想到。举凡物质引力，地心吸引律，电的现象，化学上化合的条件，空气压力及其效果，光、热、燃烧等等，总之，一切为近代科学各种物理上的理论所根据的事实，在那时完全没有被发现呢。

在那个时代，发明亦举步维艰。只为缺少望远镜，亚里士多德的天文学无异于孩子气的痴想；只因为缺少显微镜，他的生物学迷入五里雾中。诚然，希腊有许多不可及的成功，但其工业上技术上的发明却是落在一般水平之下。希腊人贱视手工业，除了奴隶之外，谁也不亲自去熟谙生产的方法，谁也不去接触机械。这样，工业技术发明的可能，只限于那些对发明不感兴趣，或即使发明了，物质上也得不到酬劳的人们。奴隶是如此之廉价，劳力比起机械来说反而更便宜。所以虽然希腊的商业战胜了地中海的各邦，希腊哲学支配了地中海的人心，希腊的科学却陷入了迷途。希腊的手工业几乎和 1000 年前的爱琴手工业无异。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研究中没有采用实验的方法，由此我们自然会明白。实验的各种器械还没有制造出来，至多他只能做到建立一种大概的一般的观察。虽然如此，他和助手所收集的大批论据，为科学的进步打下了基础。这个基础之庞大，成为人类工作的奇观之一。

亚里士多德著作本身，有好几百册。有的古代作家说他著作有 400 册，有的说 1000 册。留传下来的仅一部分，然而就这一部分而言数量已经是很大了。“逻辑”方面的著作有：《范畴》、《正位》、《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解释》、《论智者的驳诘》；“科学”方面的著作有：《物理学》、《论天》、《论生与灭》、《气象学》、《论灵魂》、《动物的分类学》、《动物的运动论》、《动物的起源论》；“美学”方面的著作有：《修辞学》、《诗学》；“哲学”著作有：《伦理学》、《政治学》、《形而上学》。

不消说，这就是希腊的“百科全书”。天下的问题和天上的问题个个都占一席之地。无怪乎亚里士多德的错误荒唐要比其他哲学家的书中来得多了。如此一个知识与理论大综合的宏大工程，令后人难乎为继。一直要到斯宾塞时代，即使是斯宾塞，其著作的宏大壮丽也不及亚里士多德的一半。用这样一种方式称雄世界，比起亚历山大野蛮的胜利来要好得多，假使哲学就是追求统一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就理应享受 2000 年中所奉给他的尊称——唯一的哲学家。

自然，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式的论断缺少诗意。尤其是把亚里士多德的文字与柏拉图的文学般的语言相比时。但是亚里士多德所给予我们的并不是那种寄寓哲学于神话譬喻之中的伟大文学，他给予我们的乃是科学，是专门化的、抽象的、统一的科学。他创造的乃是科学与哲学的术语。我们现在使用的不少科学术语就是他发明的，它们好似化石，藏在语言的地层里。“良能”（faulty）、“中庸”（mean）、“公理”（maxim）、“范畴”（category）、“能力”（energy）、“现实”（actuality）、“动机”（motive）、“目的”（end）、“原理”（Principle）、“形式”（form）——哲学思想所少不得的这些“零件”，是在他心中铸造出来的。也许，从生动的对话体到正确的科学的论说体过渡，乃是哲学发展上必要的一步。而科学作为哲学的基础与栋梁，若在表现形式上没有它自己的严格的方法，也不会发达起来。

亚里士多德所做的工作，不仅为古希腊的哲学做了一个总结，而且也为近代科学打下了奠基。

四、逻辑之创设

亚里士多德的伟大，首先在于他几乎没有先驱，而全凭自己的苦苦思索，独创了一门新的科学——逻辑学。

逻辑的意义，只是正确思考的技术和方法。它是各种科学、各种教练、各种艺术的共同学问或方法，就是音乐里也包含着它。它同样是一门科学，因为如何正确地思考，其方法是有规律可循的，正如物理学和几何学一样。它同样也是一门艺术，因为练习的结果，它能令思想不知不觉之中就会正确，就像钢琴家的手指，可以毫不费力地奏出和谐的音乐一样。但是，没有比逻辑更乏味的学科了，可也没有比逻辑更重要的学科。

应该怎样去定义一件东西或一个字眼呢？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每一条完美的定义要有两部分，要有两只踏着实地的脚。第一，要把所说的那件东西归入某一类，该类的共同性质也就是该件东西所有的，譬如，人是动物；第二，要表明该件东西所异于其他同类的东西的是在哪一点，譬如，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他的特点就在和其余一切动物不同，他是有理性的。”亚里士多德把一件东西投入其同类的大海，再取出它来，浑身浸着共同的意义，挂着其属类的徽号。同时，别的许多东西和它这般相似，却又那般相异，把它参插在它们中间，它的个性和特征就格外显著地透露出来了。

走出逻辑这道后防线，我们来到广阔的战场上，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曾为了“一般概念”这个可怖的问题同柏拉图搏战。这是第一次交锋，这个战争一直延续到现代，并且使得中古的欧洲布满了一片“实在论者”同“唯名论者”的撕杀声。亚里士多德认为，一般概念是任何一个普通名词，任何一个名称，只要一类中各分子可通用的，所以像“动物”、“人”、“书”、“树”

都是一般概念。不过这些概念乃是主观的意念，并非一个个捉摸得到的客观的实在，它们乃是名（nomi-na），并非实（res），凡存在我们身外的乃是个别的特殊的物体的世界，而非类括的普遍的事物的世界。个体的人、个体的树、个体的动物都存在，但是“一般的人”或人的一般概念，除在思想中外，并没有存在。它是一种方便的心理的抽象，并不是一种外界的现实或“实在”（reality）。柏拉图认为：一般概念之恒久与切要与真实，非个体所能比拟，——个体只是滔滔不尽的洪涛之中的一个微波。“人们”来的来，去的去，但是“人”却健行不息。亚里士多德的心理是实事求是的一种，在柏拉图式的“实在论”中他看到了无限的神秘和学者式的无意识之根源，于是尽力攻击，极其舌战之能事。所以亚里士多德说道：“我爱柏拉图，我尤爱真理。”

亚里士多德从客观的现在入手，而柏拉图则沉浸于主观的未来。“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定义有一种趋势，即离开物体或事实而倾向理论和观念，离开特体倾向通性，离开科学而倾向经院哲学。结果柏拉图如此倾心于通性，竟由通性来决定他的特件；如此倾心于观念，竟由观念来解释或选择他的事实。亚里士多德宣讲要返于事物，返于“大自然永不枯槁的面目”和实有，他酷爱具体的特件和血肉的个体。可是柏拉图呢，极其喜欢共通的和普遍的，甚至在他的理想国中毁灭了个人去成就一个完善的国家。

虽然，在历史上经常可以看到，往往年轻的战士攻击他前辈的老师，但这些年轻人自己本身就有许多与老师相同的性质。只有相似的人才会相争，而最剧烈的战争每起于宗旨上或信仰上极其微小的相左。尚具武士之风的十字军人会看出萨拉丁是个君子，同他打起仗来能够很礼貌；然而等到欧洲的基督教徒自裂为寇仇，则即使对于最彬彬有礼的对手也不留丝毫余地。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如此绝不容情，正是因为他和柏拉图是如此的相似。他也仍旧是一个抽象与通性爱好者，常常为了些貌似文饰的理论而辜负简明的事实，且不断地勉强去克制自己那种探求玄而又玄的哲学的热情。

这一点，其踪迹可以在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式学说里找到。这个学说是他在哲学上最为独创的贡献。一个三段论式包含三个命题，第三个（结论）是跟着前两个（大前提与小前提）中已承认的真理来的。譬如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而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是有理性的动物。三段论式的结构极像一条数学定理，二者各等于第三者，则二者相等；若甲是乙，而丙是甲，则丙是乙。正如数学上的结论是由消失两个前提间的公项甲而得到的一样。同样，这里三段论式也是先消去两个前提间的公项（人），再把剩下的并起来而得到结论。这里的困难在于论式中的大前提恰是有待证明的，那么“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一语早已不是普遍真确的了。无疑的，亚里士多德会说：倘使某个体看来有许多为某类所专有的性质（“苏格拉底是人”），那么自有个有力的假设，该个体也就具有该类所专有的其他性质（“有理性”）了。显然，三段论式这副工具，不是用来探求真理的，乃是用来使说理和思想清楚的。

亚里士多德对逻辑的创设无疑是一项伟大的功绩。

五、科学之组织

（一）亚里士多德以前希腊的科学

苏格拉底授人类以哲学，亚里士多德授人类以科学，苏格拉底以前并非没有哲学，亚里士多德以前并非没有科学；但是在这两个人之后，哲学和科学始有大的进步。一切都建筑在他们所立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以前，科学还在胚胎里。他一出来，科学也跟着呱呱坠地了。

希腊以前的邃古文明，也曾有过科学上的企图。但现在我们还是从暧昧的楔形和象形文字里捉摸他们的思想，我们所能见到的是，他们的科学和神学混为一谈，分辨不开来。这些“前希腊的”氏族，对于自然界中难以理解的运动都用一种自然的力来说明，任何所在都有着神灵。敢于用自然的解释来说明宇宙的复杂和神秘的事物的，始于伊奥尼亚的希腊人。他们在物理学中探求个别事件的自然的因果，在哲学中探求全体之自然的理论。泰勒斯——“哲学之父”，主要是一个天文学家，他使得米利都的土人诧异起来，因为他告诉他们：那个太阳和众星（他们所崇奉为神的），只是些火球。他的弟子阿那克西曼德，希腊人中第一个作天文、地理的图表者，相信宇宙的太初是浑然未判的一团，由此相反地相离，便生出万物来。他认为天文上的历史，乃在无量数世界的生生灭灭中，一遍遍按期反复走它的故辙。在他看来，地球因内部各种动力正在平衡状态中，所以静止地悬在空间。他认为一切星球从前都是流质，后来为太阳蒸发干的。他相信生物最初形成于海内，海水一退，就被驱到陆地上来。他认为，搁浅在岸上的动物里，有的具有了呼吸空气的能力，就变做后来陆上生命的远祖。他认为从前的人不会和现在的人一个样子，因为，假使人最初发现于世界上的时候便像现在一般，生下来的时候也如此一无所恃，也须经过如此长久的发育时期，那他当初早已没有继续生存的可能了。阿那克西米尼是又一个米利都人，他认为万物的原始状态为非常稀疏的一团，渐渐凝聚成风、云、水、土、石。物质的三态——气体、液体、固体——就是凝聚所历的阶段。热和冷不过就是稀疏和凝聚。地震是由于一块本来流质的土地忽然的凝固。生命与灵魂是一样东西，即一种活的伸张的力，无物不有，无所不在。阿那克萨哥拉，是伯利克里的老师，他似乎曾给日蚀、月蚀一种正确的解释，发现了植物及鱼类的呼吸作用。他又说明人的智力由于善用其手，手的能力始于前足交卸了走路的任务。

赫拉克利特撇下了财富，省得为它操心，自己托庇于爱非斯的一个庙廊下，度着贫苦的生活，致力于研究学问，于是他将科学从天文上移近到地球上来了。他说：万物流转变化，永远不息。即使在至静的物体中，也有非目力所能及的流转和运动。宇宙史反复运行于一次次的循环中，每一次始于火而终于火。万物的生灭，莫不由于交战。……战争乃是一切之父，一切之王。他令有的做神，有的做自由民，有的做奴隶。哪里没有交战，哪里就有堕落。一种混合物若不搅动便会分解。在变化与物竞与天择的流转中，只有一种事物恒常不变，那就是规律。这个秩序对于万物来说是平等地制约的，并没有某神或某人造它出来。可是它自过去而现在而将来，永远存在。思培多克勒发展了进化观念。他认为，各种机器不是起源于预设的计划，乃是起于选择。大自然对于各种生物做了不少尝试和实验，把种种器官千变万化组合起来。哪种组合适于环境的需要，那个生物便继续生存，并且传播它的种；哪种组合不适应环境，那个生物便遭淘汰；随着时间流逝，生物适应环境的能力也愈来愈强，愈来愈完善。留基波与德谟克里特则得到了最上层的“前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唯物论的、决定论的原子论。留基波说：“一切都是为必然所驱使”。德谟克里特道：“实在没有别的，只有原子与虚空罢了。”他

们认为，知觉乃是由于原子从物体射向感官的缘故。过去、现在、未来，有无量数的世界。每一刹那中，有许多星球正在抵触，正在毁灭，而同时混沌之中，大小相若，形状相似的原子，聚成一簇一簇。借自然的选择，有许多新的世界正在从这里产生出来。没有什么预设的计划，宇宙是一架机器。

这个约略而浅薄的概述，便是亚里士多德以前希腊的科学史。各学说的粗陋是可以原谅的。当时实验上和观察上的条件限制，使这些先驱不得不在狭小的圈子中探索。在奴隶制度的重累之下，希腊实业的停滞也使科学事业受阻而得不到充分的发展。雅典政治生活纷乱日甚，使得智辩派、苏格拉底、柏拉图，都舍开物理学、生物学上的研究而走入伦理学和政治学的理论中去。独有亚里士多德，以其学问之博大精深举希腊诸子中物理与道德两大流派汇而统之。再从“前苏格拉底的”希腊人中，把握住科学发展的线索，努力继续他们的工作，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建成一幢宏丽的科学殿堂。

（二）博物家之亚里士多德

若按年代先后看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那么我们会失望的，因为这些论文实在是一种形而上学论，只是对于物质、运动、空间、无限、原因和其他诸如此类的“终极的概念”的玄奥的分析。在他比较生动的文字里，有一篇攻击德谟克里特的“虚空”（Void）。亚里士多德说，自然界中不存在虚空或真空，因为在一个真空里面，一切物体落下来都会速率相等，而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假设的虚空原来是里面并不含一点意义”。——从这个例子，可见到亚里士多德很难得的诙谐，他惯用未证实的猜想来贬抑哲学界中的先辈。这位哲学家总是在自己著作前面，将前人对于本题所有意见做一种历史的叙述，然后，再将每一种意见驳个体无完肤。培根说：“亚里士多德，也像奥托曼的样子，以为不将他的同胞置于死地，他的朝代就不会太平。”但从他对一切前人的贬斥中，我们获得了许多关于“前苏格拉底的”学说和学派的知识。

亚里士多德的天文学比前人不免有多少进步。毕泰戈拉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亚里士多德否认这个见解，他要把这个地位让给地球，但是他有一篇论气象学的文学作品，其中倒富有鲜明的观察描写，甚至里面的玄想处也射出光芒来。这位哲学家说：这是一个循环的世界，太阳永远在蒸发大海，晒干江河泉流，结果使渺茫的大洋变成赤露的岩石；同时另一面，升腾的水汽结聚成云，再落下来又成江河海洋。什么都在起变化，不知不觉地，却自有结果。埃及就是“尼罗河之工作”，是它10万年来所淤积的结果。这里海蚕食了大陆，那里大陆伸进了大海；新的大陆、新的海洋出现，旧的大陆、旧的海洋消失，全世界的地面上变了又变，在一进一退，一生一灭的大循环之中。有时这种巨大的结果会骤然发生，将文化甚至生命毁灭掉。巨大的天灾已曾按期将地球洗劫过，使人类退回到他的原始状态。文明，如西西法（希腊神话中科瑞特国王奸滑而贪婪，令在阴间的苦工推一巨石登山，每上推一下，巨石则下落，致使苦工永无休止）一般，已经屡次快要到顶点，却又跌回野蛮状态里，又要从头重新爬上去了。于是，文明的生生灭灭之中，总是重复着发明和发现，总是同样重复着经济上文化上发展滞缓的“黑暗时代”，总是重复着知识上科学上艺术上的复兴。——这样，差不多成了“永远轮回”。无疑的，有些流行的神活乃是早前几期文化中所残留下来的暧昧的传说。所以人类的历史正在一个黯淡的圈子里打转，因为他还不能主宰那个托着他的地球。

（三）生物学之创设

亚里士多德走遍了他在的大动物园，觉得很诧异，他终于相信，生命无穷的变化可以排列成一条锁链，链上第一环和它下面紧接的一环之间几乎看不出分别来，而事实上，无论构造上，还是生物的生活状态，以及它们的生育和感觉，从最低等生物到最高等生物，一环一环总有微细的等次和进步在其中。到末尾一级，则连活的和“死的”也几乎无从辨别，“自然使无生界到有生界中间的过渡，如此之渐之眇，其分疆的界线在哪里，实在模糊可疑”。也许，就是无机物也多少有些生命呢。再者，有许多种类的生物，究竟是动物还是植物，也很难弄清。这些低等生物这般相似，要把它们归入相当的类，相当的族，常常是不可能的。所以第一级的生命里，其等次之差异，与其机能形式的不同一样值得注意。可是，尽管生命的构造形式如何繁复，有几点却是显然的，令人可信的：生命已在稳定的发展中变得更复杂更强大，智力正随着构造的复杂、形体的演化而进步了。特殊机能日渐增加，生理功能继续集中。渐渐地生命代自己创造了一个神经网络和一个脑子，于是，心灵就决然向前去主宰躯体。

可惜的是，虽然这些等次和相似点统统呈跃到亚里士多德的眼里，他却并没有走到进化论去。按照思培多克勒学说，一切器官和机体无非适者生存，这是亚里士多德否认的。照阿那克萨哥拉的观念，人的智力乃起于不用手去行动，而用手去操作，这也是他否认的。反之，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手所以如此用法，是因为他已有了智力的缘故。其实，亚里士多德的谬误层见迭出。譬如，他认为雄性在生殖上只提供—种刺激或加速，他并不曾想到（我们现在由单性生殖的实验中知道的），精液的作用倒不大在乎使卵子受孕，却主要在于使胚胎具有父亲的遗传性，可令子孙后代形成一个有力的种，一个两行祖系的新结合品。当时人体解剖还没有出现，所以亚里士多德在生理学上的错误特别多：筋、经脉的存在他不知道，动脉和静脉他也不加辨别，脑子被他视为—种降低血温的器官。他相信男子头盖里的骨缝要比女子多些，他相信男子的肋骨每边只有8条，他还相信女子要比男子少几个牙齿。

但是，他带给生物学的进步，总的说来，要比他前前后后的任何希腊人都大。他觉察到鸟类和爬行类在构造上很接近，猴子在形体上介于四足兽与人之间。有一回，他大胆宣称人和胎生的四足兽（我们称为“哺乳类”）是属于—类的动物。他指出，婴儿的灵魂和动物的灵魂几乎没有多少区别。他说食品常常决定生活状态，因为各种野兽里面，有的是成群的，有的是单独的——它们所取的生活方法，总是最适于它们……获得它们的择定的食物”。他预见到冯·贝尔有名的定律；在一个有机体的发育中，该类所共有的性质（如耳目），其形成总先于该种所专有的性质（如牙齿的式样），总先于该个体自身所特有的性质（如眼珠的颜色）；他又越过2000年，预见到斯宾塞归纳的结论；个别化（individuation）与繁殖（genesis）成反比例。这就是说，一个种族或一个个体，其发展与特殊化愈高等，则其子孙的数目也愈少，生物之返于模式（reversion to type）——即—种趋势，谓特殊的变异（如天才），将由配偶而减少，因传代而消失，这一点，他也曾加以注意与说明。他有许多动物学上的观察，曾为后来的生物学家所否认，而终于为近代的研究证实——例如筑巢的鱼类，有胎盘的鲨鱼。

最后，他又创立了胚胎学。他写道：“谁见到物体从它们起源发生出来，便把它们看得最真切了。”希波格拉底，这位希腊最伟大的医学家，曾给实

验法一个很好的先例，他把所孵的鸡卵在孕育的各期打开来观察；再将这些研究的结果引用到他一篇《论婴孩之起源》的论文里。亚里士多德也学了这个方法做种种实验。结果，他关于小鸡发育所做的一篇叙述，甚至在现代也引起一般胚胎学家的惊异。他在遗传学上一定也做过几回新奇的实验，因为当时人们传说，说生下来的孩子是男还是女，全看是哪一边的睾丸供给生殖的精液。这个说法他证实其为谬妄。他做了一个实验，将一个男子右面的睾丸缚住了，然而所生的孩子还是有男有女。他曾举出几个在近代还是很新颖的遗传学问题。伊里斯地方有一女子嫁给一个黑人，她生的孩子全是白人，可是再传到下一代，黑人又重现了。亚里士多德问道：中间一代黑色隐藏在哪里呢？从如此切要而机警的一个疑问走到孟德尔开辟一个新纪元的实验，只相差一步了。知道要问什么，可以说，即已知道了一半。毫无疑问，即使有几许谬误成为这些生物学著作的瑕疵，也无碍它们成为科学上巍巍的纪功碑。据我们所知，在亚里士多德以前，除了琐碎的观察之外，还没有什么生物学，单单这一项成功已够终生的研究，可谓不朽之业了。然而这在亚里士多德只是一个开头。

六、形而上学与神之性质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从他的生物学来的。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世界上每一物为一种内部的逼迫所推动，去变成比原来更大的一物，每一物是个“形式”（form）或实体；这个形式是从某物发展出来的，该物是它的“质料”（matter）或原料；而这个形式同时也将轮到做质料，从而将发展出更高的形式来。所以成人是形式，其质料为婴孩；婴孩是形式，其质料为胚胎；胚胎是形式，其质料为卵子；如此追溯上去，直到我们渺茫地达到一个概念，即为完全没有形式的质料。可是这样一个无形式的质料将是“无物”，因为凡物都有一个形式。质料，作最广义解，是形式之可能；形式是质料的现实，或完全的实体。质料在窒碍，形式在构造。形式不仅是形，并且形成力，为一种内在的必然和冲动，将质料依着一种特殊的形状和目的而铸造；它是质料的潜能之实现。它寓于任何物内持续动作，变化各种能力的总量。大自然便是形式战胜质料，便是生命不息的前进和胜利。

世界上每一物无不自然而然走向一种特殊的造就。决定一件事的各种原因里面，要数那个决定目的的根本原因最有决断性，为最重要。自然界中种种谬误是由于质料的惰性阻止了目的之形式形成力——因此有生机不全的废物和畸形发育的怪物来玷污生命的全景。发育不是偶然或凑巧发生的，（否则我们如何能解释有用的器官之普遍的出现，普遍的遗传呢）？每一物由其本性、构造、“隐得来希”（圆极 entelechy）在内部指点着一定的方向；鸡卵是内定或命定不变成小鸭而变成小鸡的；橡子不会变成柳树，只会变成橡树。这个说法，在亚里士多德，并不以为有一种外界的神力来计划世间的种种构造和事情；反之，这个计划是内在的，起于一物的模式与机能。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天命是和自然因果的运行完全合辙的。

然而神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还是有的，虽则这个神也许并非简单而人性的神，如出自幼稚心理的拟人化的神。亚里士多德借助于那个讲到运动的老谜语来解决这个问题，——他问：运动怎样开始的？若说运动无始，一如他所

设想的质料，那是他认为不可能的。质料可以无始无终，因为它仅是种种未来形式之永远的可能；然而那个运动和创造形式的大历程，其结果把广漠的宇宙充满了无量的形体，它是何时和怎样开始的呢？亚里士多德说：运动一定有个来源。我们若不把这个问题一步一步倒推到无穷，那么我们必将假设一个被动的最初原动者，其存在不可分割，不占空间、无躯壳、无性别、无情感、完善不变、永远无尽。神并不创造世界，乃在运动世界；他的运动世界不是一种机械力，而是世界上一切活动的总动能一般；“神运动这个世界，宛若爱的对象引动爱人”。他是自然界之最高原因，是万物之推动与目的，是世界之形式；他是世界生命之原素，其种种生机作用与活力之总量，其发展之内的来源，是使全体健行不息的“隐得来希”（圆极）。他是纯粹的能力，是经院哲学所谓的“主动（activity）之本身”，也许就是近代物理学和哲学中不可思议的“力”（force）。他与其说像一个人，还不如说像一种磁力。

虽然，亚里士多德惯于自相矛盾，又把神表示为自觉的神灵——奇怪的神灵。因为亚里士多德的神永不做什么；他没有欲望，没有意志，没有目的；他是最纯粹的能动——永不动作。他绝对完善，所以不能有什么欲望，也不做什么。他仅有的本业是静观万物之精；而因为他自己便是万物之精，是一切形式之形式，所以他唯一的职务便是静观自己。亚里士多德式的神好可怜！——竟是一个无为的皇帝；“这个皇帝虽则在位，却不进行统治”，无怪乎英国人喜欢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神显然就是摹拟他们的呀。

或者就是摹拟亚里士多德自己。这位哲学家如此爱好静观，竟把神圣之概念也献给静观了。他的神属于幽静的亚里士多德式，一点不浪漫，退入他的象牙塔，避开事物纷争和混浊，全世界不见了柏拉图的哲学王，不见了耶和华的严厉而血肉性的实体，不见了基督教的神的温和而殷勤的父性。

七、心理学与艺术之性质

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学，有着同样晦涩游移的毛病。许多文字是很有趣的。他很注重习惯的势力，称之为“第二天性”，就是自他开始的；联想律，虽不详备，也有了规定的方式。但是哲学心理上的两个根本的问题——意志自由与灵魂不灭——却没有掉在疑雾里。亚里士多德的话有时听起来像一个决定论者，——“我们是怎样，就得怎样，要直接换过一个样子是不可能的”。但是再说下去，他又反对决定论了，“我们将来怎样是可以选择的，只消失在形成将来的那种环境好了。所以我们可以借朋友、书籍、职业、娱乐等的选择来形成自己的人格，在这个上意义上讲起来，那我们是自由的”。他不曾料到决定论者的回答就在嘴边，这些形成将来的各种选择，它们自身就是我们已有的人格决定的。他坚持认为，我们惯用的衡量标准牢不可破，便先假定下道德责任与自由意志。他并未想到，决定论者从同样的前提可以达到恰巧相反的结论。

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论出发于一条有趣的定义；灵魂就是一个有机体全部的活素，就是它种种能力和作用的总量。在植物，灵魂仅仅是一种营养和生殖的能力；在动物，灵魂是一种感觉和行动的能力；在人，灵魂是理性和思想的能力。灵魂即为身体中各种能力的总量，没有身体便不能存在！二者好比表记与火漆。在思想上虽可分开，在实际上是一有机的整体。灵魂并不是

从外面放进身体里去的，如把水银注入维纳斯的肖像，使之直立一般。一个人的特殊的灵魂只能存在于他自己的身体里。虽然如此，灵魂不是物质的，如德谟克里特所说的那样，并且也不会全部死灭。人类灵魂的理性能力，一部分是被动的，这部分与记忆相维系，也随着记忆所附着的身躯而死灭，然而“主动的理性”，即纯粹的思想力，是全不凭藉于记忆，永远不坏的。主动的理性乃人之普遍的原素，与个别的原素有别；继续生存的并不是人格及其暂时的爱情欲望，乃是心之最抽象的最非人格的形式。概括地说，亚里士多德毁坏了灵魂去叫灵魂不灭；不灭的灵魂就是“纯粹思想”，不染着实在，就像亚里士多德的神是纯粹能动，不染着动作。人们有时很诧异，这样玄之又玄地把一块糕咬了几口再把它保存起来，是不是亚里士多德的明哲保身之道，以防“反马其顿派”也请他服毒呢？

在心理学较安稳的区域，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也更加别出心裁，鞭辟入里，差不多开创了美学——美与艺术的理论。亚里士多德说：艺术的创造从造成形式的冲动和感情表现的热望中跃起来。艺术的形式正是摹仿实在，它在向大自然擎着一面镜子。人在模仿中有一种愉快，显然低等动物没有，不过艺术之目的并非要表示事物外面的现象，而是要表示事物内部的意义，因为这一点才是他们的实在，表面的模样与琐屑不是它们的实在。

最高的艺术非但诉于感情，并且诉于理知（如一种和乐，其诉于我们非但借其谐调与联接，并且借其结构与开展），而这个理知的愉快乃是人所能达到的快乐的最高境界。因此，一件艺术作品，其目的应在形式，尤应在统一。这是结构的栋梁，形式的焦点。譬如，一出戏剧应该有情节的统一。庞杂的枝节，旁涉的插话，不该放在里面。然而顶要紧的是，艺术之作用在“净化”（catharsis）。有几种情感在压力束缚下蕴结于我们社会内部，势必会从反社会的破坏性的行为中骤然爆发出来，这一类的情感应在戏剧里通过无害的方式予以消逝。所以悲剧“借怜悯与恐怖，适当地将这些情感一泻而清了”。亚里士多德遗漏了悲剧的某几种特色（例如主义间人格间的冲突）。但是这个净化说，对于艺术几乎神秘的力量之了解，给了人们受用不尽的提示。

八、伦理学与幸福之性质

越来越多的青年聚集到亚里士多德门下听他教诲，他的思维渐渐从条分缕析的科学转移到行为和品性等较广泛的问题上来。他愈加清楚地感觉到，在一切物理世界的问题之上罩着那个问题中之问题——最好的人生是什么？人生的至善是什么？德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寻找幸福和充实？

他的伦理学写实似的单纯。科学的训练使他不再会宣讲什么超凡的理想等一类的空谈。正如桑塔雅那说的，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性的概念是十分健全的。每一理想有一自然的基础，每一自然物有一理想的发展，亚里士多德劈头就老实承认，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善的本身而求善，乃是要幸福（happiness）。“因为我们为了幸福自身而选择幸福，决没有另外的用意。反之，我们所以选择光荣、理知、感官的快乐，……只因为我们相信借此会得到幸福”。他觉得以幸福为至善乃是不言自明的真理，所需要的乃在说明幸福的性质与达到幸福的路径。他的取径是，先问人和别种东西所以不同在什么地方，再假定人的幸福就在专属于人的性质能得到充分的发展。现在，

人的优异之点就在于他的思想能力，借此他超出了并支配了其他一切生命；这种能力的获得给了他最高的权力，由此也可假定它的发展会给他充实与幸福。

那么，除了身体上必先备的某几点外，幸福的主要条件就是理性生活，——理性是为人所专有的光荣和权力。德，或者宁可说“优能”(excellence)，全靠判断之明晰，行为之自制，欲望之匀调，手段之艺术化。它不是简单的人所固有的，也不是天赐，乃是充分发展的人由经验得来的成功。而且，有一条路通向它，有个指点“优能”的向导，依靠它可以省却许多迂路和耽搁，那就是中庸(golden mean)。人品的性质可分成许多组。譬如，懦怯与卤莽之间为勇敢，悭吝与奢侈之间为慷慨，懒惰与贪婪之间为奋发，卑屈与骄傲之间为谦和，诡秘与滥言之间为诚实，乖戾与调戏之间为风趣，寻衅与谄媚之间为友谊。所以伦理上行为所说的“对”(right)和数学上工程学上所说的“对”没有什么差异，其意义为正确，为适合，为能做得最好而达到最好的效果。

虽然，这个中庸并不如数学上的中项一般，是确凿可计的首尾两项之平均，它为各种情形中的环境所左右变动，且只显示给成熟而能伸的理性。优能是一种艺术，从训练和熟习中得来。我们并不因为有了德性或优能而行动正确，而是行为所以正确是因为有它们。“这些德性之形成，由于人的操行”。我们反复做些什么，便成个什么。因此优能不是一个举动，是一个习惯。“人之善即是其心灵始终由着优能而工作。……正如一只燕子或一个良辰造不成春天，所以也不是一旦一夕就会使人拥有幸福”。

少年是极端的时期。“年轻人若犯过失，总偏于过度和夸大一面”。少年(及其许多长辈)的大困难，就在于要跳出一个极端而不再陷入其反面的极端。因为这个极端很易流入那个极端，或因“矫枉过正”，或为了旁的缘故：诈伪的会信誓旦旦自由，卑屈的会毛遂自荐。凡偏于极端的人总是把德性之名不加于中庸而加于相反的极端。有时这样也好，因为我们若发觉错失在这一端，“就会着眼于那一端，借此可达到折中地位，……好像人们矫正弯曲的木材一般”。然而不自觉的极端派视中庸为最大的恶。他们“排斥折中的人，勇敢者被懦怯者呼为卤莽，被卤莽者呼为懦怯，其他情形中也是如此”。

显然这个中庸学说将希腊哲学各派几乎共有的一种态度表达了出来。柏拉图谓德性为和谐的动作，苏格拉底谓德性即知识，他两人胸中早有过这种态度了。先贤(梭伦、皮达库斯、比亚士、皮瑞安德尔、克莱布鲁斯、泰勒)创立了这个传统，在德尔斐的阿波罗庙内刻着一句箴言：“勿过度”。

然而这位实事求是的哲学家又说：“中庸还不是幸福全套的秘诀。我们必得再有些世俗的财富。贫困令人悭吝剥削，宽裕令人免于忧虑贪婪而自由，此乃贵族生活安闲与乐趣之泉源。对于幸福，种种外界助力中最高贵的，当首推友谊。真正的友谊对于幸福的人，比对于不幸福的人尤其需要，因为幸福与人分享，就加倍幸福。它比正义还要紧，因为大家既是朋友，就不必讲正义了，大家已合于正义，友谊还是一种意外的嘉惠哩。”“朋友是同一个灵魂寄在两个躯壳中”。可是讲到友谊，就已隐示朋友只能有极少几个。“有许多朋友的，其实连一个朋友也没有”。“要做许多人的朋友且有完美的友谊，那决计不可能”，良好的友谊在于耐久，而不在于一时的热度，这就是说要有性格上的恒固。友谊之万花镜所以瓦解，只可归之于性格的变换。再

者，友谊必需平等，因为感恩最好也只能做个倾滑的基础。“平常以为，施恩者对其以善意相加的受恩者所怀的友谊，比受恩者对施恩者的来得多。对于这件事，使大多数人满意的说明是这样的：一边是债户，一边是债主，……债户希望债主不要站在他面前，而债主却盼债户要保留着。”亚里士多德反对这个说法，他宁愿相信，施恩者方面更深的感情就好比艺术家对作品、或母亲对子女的爱情。我们爱我们所造的。

而今，虽则外界财富与友谊为幸福所必须，幸福的精髓仍在我们身内，在知识的圆满与心灵的清明。当然感官快乐不是路径，那只是个圆圈，正如苏格拉底形容较粗浅的伊壁鸠鲁学派的观念所说的，我们搔了可以痒，痒了又可以搔。政治生涯也不是路径，因为在那里行走只好听命于人民心理的忽然变化，而反复无常的再莫甚于群众。什么都不对，幸福定要是心灵上的快乐，只有从真理之追求和获得上来的，我们才能相信。“理智之活动……其目的在于，不在本身之外，而就本身之内找得快乐，即借以激起更高一层的活动。因为自足、不倦、优游等的性质……显然属于这种事业，圆满的幸福一定在这里”。

九、政治学

（一）理想国与保守主义

基于如此贵族主义的一种伦理学，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严格贵族主义的政治哲学。一个皇帝的师傅，公主的丈夫，说他对于一般平民，即或对于那商人的中等阶级，有什么过分的关切，本来不是人们所侈望的。我们的宝藏在哪里，哲学也在那里。不过，亚里士多德的保守乃出于真诚，因为当时的骚乱灾祸都是雅典民主政治的结果；他如一般的学者，希望着秩序、稳定、和平。他觉得这个时候不能再鼓吹进行政治上的鼓动了。激进主义是社会稳固的奢侈品，只有事物已经在我们手里放稳的时候，我们才敢于去将那些事物变动。亚里士多德说：一般看来，“轻于变法是罪恶。如果变了只有小利小益，那么一些弊端，无论在法在君，还不如处之以哲学的容忍。一般国民如因变法而养成不服从的习惯，那就得不偿失了”。法律之所以能令人遵守，并因此而维持政治的稳定，其因大半植基于风俗习惯。“轻于从旧法改到新法，将耗损一切法律之精华”。“愿我们切勿轻视时代的经验。在过去的无数年月里，这些东西，如果真是好的，早就不会埋没到现在了。”

“这些东西”当然主要指柏拉图的空中楼阁似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在这一问题上攻击柏拉图的实在论，在政治问题上攻击柏拉图的理想主义。从那位大师所作的一幅图画上，他找出来许多毛病。柏拉图将他监护的一班哲学家投入不断的交接之中，如在军营生活一般，这是亚里士多德不喜欢的。亚里士多德虽然守旧，却视个人的个性、幽独、自由为珍宝，比对社会方面的效率与权力更看重。他无心称一切同辈为兄弟姊妹，也无心称一切长辈为父亲母亲。人人是兄弟，等于没有兄弟。“做一个真正的表亲，比做一个柏拉图式的儿子要好不知多少哩”。

在一个妻子儿女公共的国家里，“爱情是淡水气的。……唤起关切与情爱的二项主要性质——如某某是你自己的，再如某某令你觉到真心的爱——一项也不能存在于这样一个国家里”，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中。

讲到人性，平均的人，那是近兽而远神。大多数人是天生的蠢物和懒汉；无论何种制度之下，这班人总是沉在底下；将国家的公帑来补助他们，“无

异将水倾入漏卮”。这种人在政治上只能被统治，在事业上只能受指挥。若可能，就由他们自愿，若必要时，也不必去问他们肯不肯。人们，“从他们落地的时辰起，显然有的注定是服从的，有的注定是发号施令的”。“因为能用心灵作远虑的人，天生要做主人，犹如躯体之于心灵；正因为躯体应该听命于心灵，“为一切劣等人设想，他们最好应在一个主人的管辖之下”。“奴隶是含生命的工具，工具是无生命的奴隶”。于是这位硬心肠的哲学家写道：“假使各种工具都会自营其工作，服从或秉承他人的意志，……假使机杼自会纺织，琴拨自会弹琴，不消手去管理它们，那末大匠也无须小工，主人也无须奴隶了。”

这种哲学反应出希腊人贱视手工劳动。这种工作在当时的雅典还没有现代复杂。现代有许多手工劳动所需要的智力，往往比中等发达社会的一般劳动所需要的智力大得多，甚至一个大学教授也会把一个汽车匠（到紧要关头）看作神明的。可是在那时候，手工劳动真正只用着手。亚里士多德从哲学的峰巅下望，认为劳动属于无心灵的人们，只合奴隶去做，只是将人们配入奴隶制度。他相信，劳动使心灵愚钝堕落，且令人再也无暇无力去从事政治掌握知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似乎只有那些有闲的人们才可以在政府中发言。“最好的国家不准工匠有公民权。提布斯有一条法律，一个人距停止营业而退居的时候未满 10 年，不准做官”。就是巨商与理财家，也被亚里士多德归入奴隶一类，“零售转卖，最不自然，……这类情形，是人们互相剥削。这类交易之最可恨的一种是……重利盘剥，这是从钱的本身榨取利益，并非从钱的自然运用，因为钱是用来作交易之工具，并非用来做利息之产母。这个重利盘剥（tokos），其意义为由钱产钱，……是各种营利中最不自然的一种。”钱不应繁殖，所以，“财政理论的研讨，虽非哲学所鄙弃，但从事理财或发财，是所耻于自由人。”

（二）婚姻与教育

亚里士多德认为，女子于男子，等于奴隶主人，劳力者之于劳心者，野蛮之于希腊人。女子乃是未完成的男子，在发展的阶梯上落后几级。“男的生性优越，女的生性卑劣；一个统治，一个被统治；这个原则必然推广到全人类。”女子意志薄弱，所以人格与地位不能独立。她最好的境界是安静的家庭生活，她在对外关系上受男子支配，在家务上可以独揽大权。女子不该令其和男子相似，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一般；反之，倒该增进他们的相异；“男子之勇与女子之勇并不一样，如苏格拉底所设想的：男子之勇在指挥上表现，女子之勇在服从上表现。……如诗人说的：‘静默是一个女子的光荣’。”

亚里士多德似乎认为，使女子为奴隶，在男子是一种可贵的成功，而这种成功的能否，全在于权威不是藉于舌而藉于力，他劝男子将结婚延期到 37 岁左右，然后娶一个 20 岁模样的少女。一个女子在 20 岁光景，通常是 30 岁男子的劲敌，但一个 37 岁历经训练的战斗士则能制驭她。引亚里士多德到这个婚姻的权理上来的，是这样一种设想，即这样年龄不等的两个人差不多会同时消失他们的生殖力和热情。“若男子还能生殖而女子已不能生育，或易地以处，那就会起出争端和意见来。……因为生育的时期，在男子常常限于 70 岁以内，女子则 50 岁以内，他们结合的开始应与这些时期相符合。男女年纪太轻，其结合有害于子女的生育。一切动物里，凡幼年所产的总是发育不良，并且常常是雌的。”健康比爱情更重要。并且，“不早婚有裨于节制，因为早婚的女子易流于淫荡，而在男子呢，若当发育时结婚，体格也就耗亏

了”，这些事情不该由着年轻人任性，而应在国家的监察管理之下。国家应将两性最高和最低限度的婚姻年龄，怀孕最相宜的时期，人口增加率，一一规定出来，若自然的增加率太高，可用堕胎来替代杀婴之惨。“乘感觉与生命未萌之前，就把胎堕去”。每一国家，其人口应有一理想的数目，与其条件和资源成比例。“一国人口太少，就不能得到应有的人数上的自足；一国人口太多，……就几乎不能有什么立宪政体，什么民族的或政治的统一。”人口满了1万，一个也不要再多了（指城市国家而言）。

教育也应该在国家的掌握之中。“最足以使宪法垂之永久的，莫善于将教育制度适应于政体。……国民应该造就得和他所处的政体相符合。”学校由国家管理，就可引导人们从工商业转向农业；就可训练人们，一面保持私产，一面拿出他们的家当来作公用。“善人之间，其财产的运用，将依着一句老话，‘朋友应该什么都公共的’。”不过尤其要紧的是，国民非自小教他服从法律不可，否则则不能立国。“有句话说得好：‘一个不晓得服从的人，必不善于指挥’，……好国民应该二者兼能。”只有国家掌管和学校制度，才能够在民族分立之中，做到社会的统一。国家乃是一个复数，必借教育来把它做成一个统一体与共同体。再说，从国家来的大恩惠，从社会组织中来而未被重视的安全，从法律来的自由，这些也要教给少年。“人，若给他完成，那是动物里面再善没有；若让他孤立，那是恶之尤恶；因为不义而加上了武装，就格外危险。人生下来就有智力做他的兵器，若再有种种性质，他就用来达到顶顶卑污的目的。因此，人若没有德性，就是一切动物中顶顶野蛮的东西，充满贪淫的欲念。”而能够给他德性的，只有社会管理。人类从言语进于社会，从社会进于智力，从智力进于秩序，从秩序进于文明。在这般一个有秩序的国家里，个人面前有一千个机会一千条道路由他去发展，这是孤独的生活永远不会给他的。“一个人独自去生活”，那么，“他不为野兽，即为神明。”

因此，革命差不多总是愚蠢盲目的。它也许会带来一些利益，不过要以许多损害为代价，最严重的是，一切政治利益所凭借的社会秩序和组织都被扰乱甚至遭到解体。革命的种种更新，其直接的效果也许可以估计，有所裨益；但是其间接的效果不可估计，而且少有不为大患的。“人若只将区区几点打在算盘上，那么下一个判语是极容易的。”一个人很容易当机立断，假使他所当的机是极微细的话。“年轻人容易受欺，因为他们急于希望”。由来已久的习俗，加之以压迫，导致革新的政府于覆亡，因为习俗在民间，牢不可破，性格毕竟不比法律容易改变。假如有一种宪法得垂之永久，必是因为社会的各部分无不愿意维持它。所以统治者要避免革命，应该阻止贫富的悬殊，——“这种情形常是战争的结果”。一个独裁的君主尤其“应该在崇拜神灵上表示热诚，若人们因其君主信教而信神，他们就不大惧怕在他的统治下会遭到冤枉，也不大会谋反叛逆，因为他们相信神明也保佑他，帮他打仗的”。

（三）民主政体与贵族政体

在宗教、教育、家庭生活诸方面，有了这般的种种保障，有史以来的政体就无一不是合理的。一切政体都是善恶相混的，各适于相应的情形。理论上讲起来，理想的政体是一切权力集中于一个至善的人。荷马的话是对的：“多数人作主就坏事了，让一个人来做你们的君主罢。”法律对于这样一个人不是一种限制，而是一种工具。“对于才能卓越的人们没有法律，——他

们自身就是一种法律。谁要为他们制造法律，那简直可笑。他们拿狮子的话来请教你；在安提斯泰尼一个寓言里，野兽开起会来，正当兔儿开始激烈的演说，要求大家一律平等的时候，狮子开口道：‘那末你们的爪牙在哪里呢？’”

不过实际上，君主政体常是最坏的政体，因为大才与大德不易兼备于一身。所以最好实行贵族政体，让少数有识有能者来统治。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这东西太复杂，其问题不是单由人数多寡就可决定的，小些的问题亦须留待智者。“正如医生应由医生评判，其他的人也应由其同侪评判。……这个原则岂用于选择呢？因为正确的选择只有有知识者才能够办，譬如，一个几何学家会正确选择几何学上的问题，……所以无论选举官吏也罢，责问官吏也罢，都不应该委之于多数。”

世袭贵族政体的困难在于没有永恒的经济基础。新兴的财主不断产生，官职迟早将落入出价最高的竞买者囊中。“最高的官职也可用钱买，实在糟极了。法律准许如此妄为，必然导致看重财富甚于才能，而致举国贪吝，因为一国的居高位者贪财，其国民未有不从而效尤的”。“哪里才能不居首要，哪里就不会有真正的贵族政体。”

民主政体常是反对富人而革命的结果，“统治阶级的贪利，势必弄到孤家寡人的地步”，“而民众一天强似一天，终于打倒了他们的主上而建起民主政体来”。这种“贫民统治”也有些好处。“人民的评判，虽然个别看来也许不及有专门知识的人，但整体看来倒也不差。再者，艺术家作品的评判，最好不出于他们自己，而出于不会那种艺术的人。例如一座房屋，其享用者或主人的评判胜于匠人。”而且，“多数人比少数人不容易腐化，好像巨量的水比一勺的水不容易弄脏一般。个人难免陷于忿怒或各种激情，以至他的判断不由不迷入邪途；但是大多数人同时因一种激情而跑到歪路上去，乃是我们所难设想的。”

然而总的看来，民主政体实在不及贵族政体。因为它的基础筑在虚假的平等上，它乃“产自一个臆想，以为一方面既然平等了（例如法律方面）；各方面也必平等。人们因为有了平等的自由，也就要求绝对的平等起来。”结果，才能因人数而捐弃，人数更为奸诈所操纵。民众是如此容易受骗，如此毫无主见，所以投票权应该限于有知识的人。我们所需要的，乃是贵族政体与民主政体的结合。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最能体现这种结合的，就是立宪政体。它固然不是最理想的政体，——那是一种由教育造就的贵族政体，——却据说是可能好的政体了。“我们必须问一问，对于大多数国家，最好的宪法是什么，对于大多数人民，最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不要擅设一种普通人达不到的优能标准，不要擅设一种因天性或环境而有特别偏袒的教育，也不要擅设一种虚无的理想国家。不过心上要存着一种生活，为大众都能参加；和一种政体，为一般国家都能企及的。”“开头，不得不假定一个普遍应用的原则：国中愿意这种政体存留的人们，其权力必须强于不愿意其存留的另一部分的人们。”而权力之所寄，不仅仅在人数，也不仅仅在财产，更不仅仅在军事或政治的才能，而在这些方面的综合，所以必然也会顾到“自由、财富、修养、高贵的家世等等，不仅人数的超越而已”。现在到那里去找这样一个“经济上”的大多数来支持这个立宪政体呢？恐怕只好求之于中等阶级。这里我们又遇到中庸了，正如立宪政体自身即民主与贵族政体间的中庸一般。这个国家将

是十分民主主义的，因为一切官衙门前的路途无不公开于人；同时也是十分贵族主义的，因为官衙的门是关闭的，只让已历过仕途且已有充分准备的人们才得进去。无论从哪一面走向这个永恒的政治问题，我们总能达到同一结论；应由公众来决定追求什么目的，但只由专家来选择和施用方法；选举应该范围广大以合于民主主义，但官职只留待有准备而精选的至善者。

十、小评

求知是人的本性。亚里士多德一生都为求知的愿望所激励。他坚信人类光辉灿烂的未来只有通过持久不懈的学术研究、逐渐积累知识才能达到，并因而告诫我们说，按求知的欲望行事，实现自我，乃是人生最崇高的目标，从事理智活动，进行思辨的生活才是真正幸福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但是由于他所处的历史年代和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他的学说动摇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而他的政治学说，更是从他所在的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为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而服务的。虽然如此，亚里士多德那里留有许许多多的珍宝，供后人挖掘、继承。对于亚里士多德，我们只想说：“进来吧，无须顾虑，这里也有神明存在。”

亚里士多德是欧洲思想史上影响极大的哲学家，马克思称他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赞誉他为“古代最博学的人物”。

